

# 细石叶工艺产品废弃的文化过程研究

陈胜前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摘要:** 细石叶工艺产品是如何废弃的、受哪些因素影响、又如何在考古遗存中得到表现,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课题。本文从考古遗存废弃一般过程的理论研究着手,确定影响细石叶工艺产品的因素包括史前狩猎采集者的生计策略、废弃过程中人们的行为选择两个方面;与此同时结合细石叶工艺性质预测细石叶工艺产品可能的废弃方式;然后回到对经验材料点(籍箕滩遗址)与面(华北地区主要细石叶工艺遗址)相结合的分析。整体而言,华北含细石叶工艺产品诸遗址的废弃呈现出多样的形态,有迅速而预期返回的废弃方式(籍箕滩遗址),有计划且不准准备返回的废弃方式(如清泗涧遗址),有人类经常光顾但不留宿的遗址(如孟家泉遗址),还有废弃迅速的临时营地(如柿子滩遗址)和狩猎动物的瞭望点(如大岗遗址)。

**关键词:** 细石叶工艺; 废弃; 文化过程; 生计策略

**中图法分类号:** K8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193 (2008) 03-0210-13

## 1 前言

细石叶工艺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首先出现于华北地区的新技术,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主要分布于长城以外的地带。细石叶工艺是一种有利于狩猎采集者高度流动生计的石器技术,它是两面器技术传统和棱柱状石核技术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是狩猎采集者对于末次盛冰期(LGM)前后资源变化的适应,它还是流动性狩猎采集生计发展的顶峰,它起源于LGM前后华北腹地<sup>[1]</sup>。在理论与生态学的角度讨论之后,有必要回到考古材料的分析上来。然而在分析考古材料之前,非常有必要了解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以今天人们的生活为例,一个地方废弃之后残留之物和原来的生活场景是无法比拟的,所以也不难理解远古人类的生活遗留经过后期各种因素的干扰以及考古学家选择性的发掘、整理之后,和原来的面貌可能相差甚大。因此研究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对于考古学家发展可靠的解释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步骤。这个方面的研究在我国除了一些介绍之外<sup>[2]</sup>,很少有具体的开展。本文的目的是抛砖引玉,希望通过对细石叶工艺产品废弃的文化过程分析,为这个方面的研究找到一个出发点。文章的前面部分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考古材料的分布形态提出了一些预测,后面则从点(单个遗址的分析)与面(一个地区的分析)两个角度来分析细石叶工艺产品的废弃过程,验证预测。

收稿日期: 2007-04-19; 定稿日期: 2007-09-13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2006CB806400); 人事部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目资助(隶属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作者简介: 陈胜前(1972-),男,湖北嘉鱼人,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史前考古学研究。

E-mail: chenshengqian @ivpp. ac. cn

## 2 细石叶工艺产品的构成

按照操作链追溯,细石叶工艺产品构成可以归结为以下 10 类<sup>[1]</sup>:

(1) 两面器石核毛坯。不同技术有不同的毛坯如楔形石核毛坯、船形或漏斗形石核毛坯(棱柱状石核就可以用这种毛坯)。

(2) 热处理痕迹。有的原料必须经过热处理之后才能生产细石叶,一般是对两面器进行热处理,热处理后的石片或石叶的剥离面会有类似脂肪的光泽<sup>[4]</sup>。

(3) 去皮石片。加工两面器毛坯导致的产品,除了有部分的天然石皮外,石片背面(与石片劈裂面相对的一面)有较多的石片疤痕,显示连续的修理过程。

(4) 修理石片。两面器毛坯修理大体成形之后,还需要对其边缘进行细致的修理以得到平直的边缘,然后可以剥离第一剥片(我国学者俗称鸡冠状石片)和打制削片(ski spall,或称雪橇形石片),这类石片大多细小,石片背面密布修理石片疤。

(5) 打制削片前的摩擦痕迹。在打制削片前,往往需要摩擦毛坯的边缘以得到一个较小的台面,然后从这个台面上打击毛坯石核,剥离削片,所以摩擦的痕迹可以见于削片、细石核、第一剥片上。

(6) 削片。楔形细石核的毛坯为获得台面,经常会通过剥离一片或数片雪橇形的较大石片来产生台面。削片的形制特殊,是细石叶工艺的典型标志之一。

(7) 第一剥片(lame à crête)。这是第一片剥制下来的石叶,断面一般呈三角形,其背脊是修理后的毛坯边缘,和一般石叶不同。

(8) 修理台面所导致的石渣。在剥制细石叶的过程中,必须不断修理台面,特别是除掉边缘的突起以保证台面的坚实,这样的石渣非常细小,考古发掘过程中一般忽略不计。

(9) 细石核。毫无疑问它是细石叶工艺最典型的产品,它包括从核坯、刚刚开始剥片到原料几乎耗尽各个不同阶段的细石核。

(10) 细石叶。它是细石叶工艺的最终产品,它的数量、质量决定细石叶工艺水平的高低,它的发现地点、废弃方式决定细石叶工艺所代表的生活方式。

这 10 类产品中,除了热处理痕迹和打制削片前的摩擦痕迹之外,都是具体的产品,即具有实体的个体,而不是附加于个体之上的特征。尽管这些特征对于判断细石叶工艺存在与否有一定的标志意义,但在研究废弃过程时,将只考虑具体的产品,特别是标志性的产品:细石核和细石叶,当然这不意味忽视其他的产品。必须同时考虑到细石叶工艺加工过程中不同阶段产品的废弃地点与方式,才能够把握一种细石叶工艺产品废弃的特点,以及它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还必须把细石叶工艺产品的废弃放在整个石器组合中来考虑,因为细石叶工艺产品并不是一个人群使用的惟一一类石制品,它们只是这个石制品组合中一个部分,比如临时用于砍砸的大型石器,以及没有保存下来的众多的有机工具,对石器组合中其他组分的研究比如工具比例、工具类型的研究可以从另外的侧面帮助了解细石叶工艺产品的废弃;再之考古遗存的废弃还包括整个遗址的废弃,这是考古学家更加关注的对象,石器组合的研究必须放在整个遗址过程研究中才容易理解、才能发掘出更多的意义来;最后还可以考虑整个地区的废弃,或者是一种技术形态如细石叶工艺的放弃,它们对于宏观把握史前人类生活方式变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疑这些大框架的废弃过程同样会影响到具体

细石叶工艺产品的废弃。

### 3 影响细石叶工艺产品废弃的主要因素

废弃的文化过程研究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遗址废弃之前人类活动的特征,也就是说人类在这个遗址中曾经从事的活动;二是在废弃过程中人们的行为特征,即他们如何进行废弃,他们的决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相互关联,前者提供的文化背景和材料,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进行的。

狩猎采集者行为模式按 Binford 的分类可以分为两种策略<sup>[5]</sup>:寻食者(forager)和集食者(collector)。寻食者每天都要去寻找食物,他们没有长期储备食物的设施。一个地方的资源总是有限的,他们不得不经常搬迁,因此他们的流动性更大,在一个遗址中居留的时间比较短,废弃物少,堆积物薄,在考古学上保存和发现的可能性都比较小。而集食者相反,他们有中心营地(residential camp),有储备的习惯,他们经常通过派出特定的任务小组去获取食物,因此会有野外的临时营地(field camp),他们还会储备材料(cache),在野外有屠宰猎物的地点(butchering site)、狩猎动物的瞭望点(hunting station)等<sup>[6]</sup>。很显然,在中心营地可以看到种类更为丰富的废弃物,堆积也相对更厚,比如从工具的角度来看,这里废弃的工具数量要更多,最关键的是工具的种类更加丰富——代表更多样的活动内容。而在临时营地看到废弃物种类比较少,堆积也会比较少。集食者经常按季节搬迁中心营地,如北美的印第安人,夏处高山以避蚊虫,冬处河谷、山林以避风保暖。不同季节的营地废弃物会有所不同,有时甚至会让考古学家误认为是两种文化或是两个群体的生活遗存。

就废弃过程中人们的行为特征而言,影响因素众多。一般来说,在搬迁时是否是有计划的、是否考虑返回会影响到废弃物的构成与分布,根据这两个变量,理想状态下的文化废弃过程有如下几种情况<sup>[7-8]</sup>:

一、是有计划的废弃,如果考虑到下一个季节返回的可能,可能会留有一些还可以使用的材料,甚至储备材料,这样,遗址中还可能发现有不少还可以使用的材料,如石料、工具毛坯等,遗址的活动面会有所清理,遗物有可能集中分布,但遗物与活动区的关系不大密切。

二、仍是计划的废弃,如果决定不再返回本地,能带走的东西都会带走,缺少还可以使用的材料,遗址的活动面就可能被破坏,在生活场所会出现废弃物,遗址的生活活动面很混乱。

三、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遗址迅速地被彻底放弃,人们预期不再返回,这样遗址中除了可以发现很多有用的东西外,这些东西还应该分布在原来使用的地方,当然能带走的东西仍然缺乏。

四、人们因为某些原因,比如去追赶突然到来的动物群,他们匆匆离开,只是暂时放弃遗址,预期还要返回。这种情况下遗址的保存状况最好,绝大部分东西都在原位,连部分能带走的东西也会留下来,因此也会存在许多还可以使用的东西。

如前文所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叶工艺代表着一种高度流动的生计方式。而这种工艺主要分布于温带和寒带地区。在这个地带,狩猎采集者必须有一定的储备才能生存,狩猎往往比采集更加重要,民族学材料显示他们更多是集食者<sup>[9]</sup>。因此,这个时期人们应该有中心营地,而且在中心营地的居留时间随着旧石器时代的结束而会显著地延长。不过他们应该有更多的临时营地,很有可能因为人口的增加、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领地的边界更加

清楚,所以每个群体的活动范围都受到限制,他们只能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通常是几十平方公里)强化利用资源,这也是农业起源的前奏<sup>[10-11]</sup>。也由于人们在有限区域内活动频繁,会留下更密集的考古遗存,从统计学的角度说,应该有更高的考古发现机率。

我们可以预测中心营地的废弃应该更有计划性,废弃的过程相对更长,也有可能返回,其遗物的分布有更大的变化性。如果发现比较多还可以使用的材料或是工具,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是预期返回的有计划的废弃;如果遗物混乱、零碎,可以考虑是不打算预期返回的有计划废弃。当然,考古学家最希望发现的还是那种因为某种原因突然放弃的遗址,大部分遗物都和使用地点关系密切,对考古学家发展解释非常有帮助。临时营地、屠宰地点、狩猎动物的瞭望点废弃的速度要快得多,很少会考虑返回的可能,这种类型的废弃物中可以带走的东西缺乏,遗物也很少会集中分布,但遗物与活动区的关系会得到保留。此外,如果一个遗址被重复使用,破坏就难以避免,尤其是遗址废弃之后,儿童玩耍或是偶尔重新利用一些材料,都会影响到从前的布局<sup>[12]</sup>。那些作为原料产地的遗址,遭到后期破坏的可能性最大。考虑到旧石器时代搬运困难,除非是特别罕见的材料,或者已做成工具毛坯,当地一般能够采集到的石料不能作为还可以使用的物品。

细石叶工艺的核心产品是细石核和细石叶,相关的副产品主要是两面器毛坯和大量加工和修理毛坯时产生的除皮石片和修理石片,另外有一定使用功能的副产品就是削片和第一剥片,这些产品可以勉强用作雕刻器。两面器本身是一种多用途的器物,既可以用作石核生产石片或加工成细石核生产细石叶,也可以直接用作工具,有比较长的使用寿命<sup>[13]</sup>。多用途的两面器也是器物制作标准化的产物,它本身就是高度流动生计的反应,进入新石器时代也就衰落了<sup>[14]</sup>。实际上,修理了边缘的细石核同样可以用作多用途、长寿命的工具。而轻、薄、窄、小但边缘平行的细石叶大多用作复合工具的边刃,通过动植物胶、松脂、蜂蜡或者沥青粘在柄上最为牢靠;民族学的材料显示复合工具的制作中,做柄非常耗时,澳大利亚土著石镞柄要用上二十年,北美 Cheyenne 的鹿角柄可以用上五代,男人总是不愿丢弃他的箭杆,往往在上面做上主人的记号<sup>[15]</sup>。因此,遗址中所见往往都是反复修理使用后的废品。镶嵌细石叶制作复合工具必须用火和粘合剂,这个过程只能在营地中完成。

总而言之,对含细石叶工艺遗址的废弃可作如下的预测:一是临时营地数量大,分布更密集,我们更容易发现,这类遗址中遗物种类单纯,数量比较少,分布也不集中,属于迅速、且不考虑返回的废弃方式。二是由于这些狩猎采集者在有限区域内频繁的活动,细石叶工艺遗址应该常以地点群的形式出现,其中遗物种类丰富、数量众多的地点,可能是中心营地,遗物单纯、数量少的地点则可能是临时营地。三是在华北地区随着旧石器时代的结束,新石器时代到来,含细石叶工艺的遗址应该体现出狩猎采集者流动性的减弱,或曰定居能力增强,遗址中的遗物种类更加丰富,可能包括新石器时代成分如陶器、磨制石器、房址甚至是谷物驯化的证据。四是细石叶工艺代表高度流动的生计,那么,细石核与细石叶的废弃方式就不应限于遗址中,其分布范围应该非常广,遗址的周边地区都会有发现,细石叶的分布还要广泛,成品的废弃应该更多在野外,而非遗址中。最后,鉴于高度流动的生活,细石叶工艺产品的废弃很少会见于同一遗址中,细石核的原料加工可能在遗址外进行,形成坯材之后带入遗址,而毛坯的修理、石叶生产可能在遗址中进行,因此细石核的废弃应该在遗址中;镶嵌了细石叶的复合工具主要在遗址之外使用和废弃。

### 4 籍箕滩遗址细石叶工艺产品的废弃

籍箕滩遗址是一个经过系统发掘的遗址,出土材料相当丰富<sup>[16]</sup>,其细石核部分笔者曾整理过<sup>[17]</sup>。籍箕滩遗址共发掘了三个探方,分别是 T1、T2 和 T3,其中 T1 和 T2 相距近百米。文化层包括 T1 中层、T2 上层与下层、T3 上层共计四个文化层,其中 T2 下层的遗物最为丰富。原发掘简报认为这几个自然文化层出土的石制品基本相同,未作分层研究,但提到“下层石料的角页岩成分明显增多,镑状器仅见于下层。”<sup>[16]</sup> 鉴于现有材料的限制,我们权且认为其他文化层的遗物都混入了 T2 下层中。下面要从具有偏差的材料中进行合适的推理,从而了解这个遗址以及细石叶工艺产品的废弃过程。

从石制品的整体构成来看(图 1),断块与碎屑占绝大多数,如果包括石片、断片、残片则废品的比例更高。可以因此认为籍箕滩遗址中存在石器的加工和修理,特别是削片的存在,表明在遗址进行了细石核的加工与细石叶的生产。很显然,废品的产生与这两类活动有关。细石叶工艺产品中本身就包括除皮石片、修理石片、修理台面的碎屑这些废品,如果两面器毛坯也是在遗址中生产的,那么就会有断块出现。籍箕滩细石核的原料就来自于附近的河沟中,沿河沟往上不到两公里就可以见到该种材料的地质露头(笔者曾在此调查过)。因此有理由相信籍箕滩遗址中进行了细石叶工艺所有产品的生产,包括两面器毛坯(也就是细石核的预制品)。原料的丰富可能是这个遗址最重要的吸引力,储备原料并不重要,因为这里就是原料的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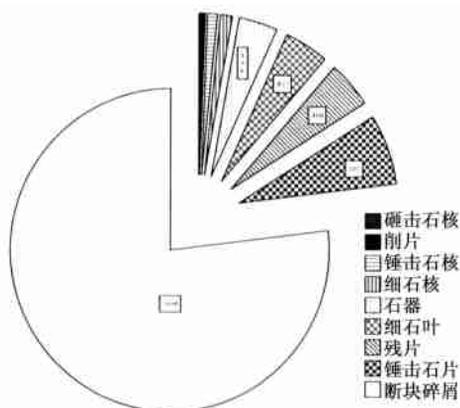


图 1 籍箕滩遗址石制品的组成分类统计  
The composition of stone tools from Jijitan S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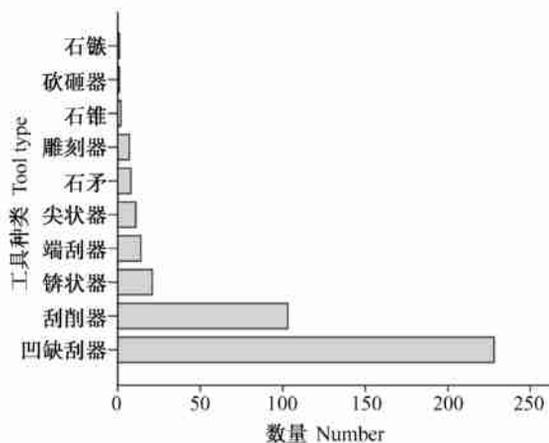


图 2 籍箕滩遗址的工具种类统计  
Tool types of Jijitan Site

当然,判断一个遗址居留的长短石制品的数量不是最重要的指标,如果籍箕滩遗址只是用作石器制造场,有如此之多的废品自然在情理之中;但是籍箕滩遗址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工具,其中工具的数量远不如工具的种类重要,工具的种类反映的是活动的类型。如果遗址是迅速放弃的,那么工具的数量大致可以反映该种活动的强度;而如果遗址是有计划地放弃的,工具的保留可能存在较大的偏差,数量就不一定能准确反映活动的强度。籍箕滩的工具组成中突出的特点是存在较多的凹缺刮器(图 2)。凹缺刮器与雕刻器、尖状器一起可以用

来加工骨角工具,这表明遗址中还有其他类型工具的生产。刮削器为一般生活多用途的工具。端刮器和石锥可以用以加工动物皮毛,加之籍箕滩遗址中也发现七种哺乳动物化石,并有用火痕迹以及人工砍砸、刻划动物骨骼的痕迹。因此可以认为古人在籍箕滩不仅生产细石叶工艺产品,而且还在这里进行了多样的生活。石锥和石镞属于轻型、易携带的工具,加工不易,其数量很少正在情理之中,也可以认为籍箕滩遗址中轻型的工具可能随身带走了。

籍箕滩的工具组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存在较多的铍状器和石矛,这两类工具都属于较大型的工 具,加工不易,对于迅速搬迁而言属于不易携带的东西,而如果是 有计划的彻底放弃,这些东西可能带走,很显然,籍箕滩遗址不属 于有计划的彻底放弃。如果考虑到遗址中还有相当数量处在剥制 石叶中间阶段的细石核(图 3、4),也可以排除预期不返回的可 能性,当时的人们正是考虑到以后要返回,所以才把这些还可以 使用的东西废弃在这里。其中细石核属于很轻便又难于加工的 石制品,如果搬迁的不是很匆促的话,这些正处在细石叶剥制 高峰阶段的细石核不应该废弃掉,所以可以考虑籍箕滩遗址是 迅速、但预期要返回的废弃方式,当然古人可能由于某种原因 并没有按计划返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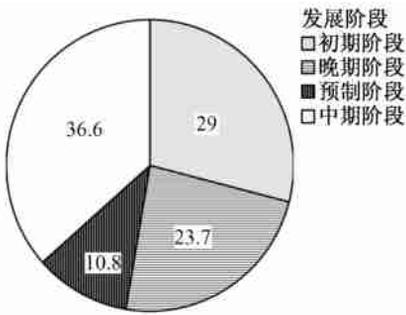


图 3 籍箕滩细石核的发展阶段  
Operational stages of Jijitan microco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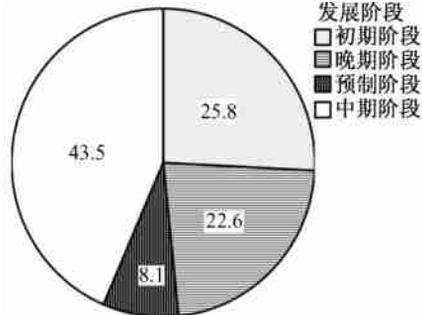


图 4 籍箕滩遗址 T2 下层细石核发展阶段  
百分比统计(总数为 62 件)  
Operational stages of microcores from the  
T2 lower layer in Jijitan Site

前文已提及原始报告中说铍状器仅见于 T2 下层,典型的石矛头也主要见于此层,这一层也是遗物最为丰富的层位。单独统计其细石核的发展阶段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和所有细石核材料合在一起的分析结果相比,T2 下层处在细石叶剥制中间阶段的细石核明显要多(图 4),相差近 7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 T2 下层所代表的籍箕滩遗址废弃的文化过程是迅速的。铍状器的保留进一步支持这个判断。丰富的遗物则是另一个侧面的证据,迅速而预期返回的遗址留有最多的遗物,所有的遗物往往都和活动区有紧密的联系,同时它还证明这个遗址中进行过多种多样的活动,有较长的居留时间,所以可以把 T2 下层代表的籍箕滩遗址看成是一个中心营地遗址。而在其他层位时期的籍箕滩遗址可能只作为临时营地使用,遗物比较少,废弃过程是迅速的,这些层位中也有少量处在细石叶剥制中间阶段的细石核(T3 的 14 件细石核中只有 2 件处在中间阶段,T1 的 10 细石核中有 4 件处在中间阶段),比例低于 T2 下层。如果要作一些区分的话,T3 时期的籍箕滩遗址废弃比较彻底,T1 时期的废弃过程则比较迅速,由于材料偏少,这种说法的误差可能也比较大,结论不如 T2 下层那么确凿。

中期阶段的细石核剥片面长、剥面宽、叶脊多且匀直,预制阶段为两面器毛坯,初级阶段时剥片很少;晚期阶段时,石核缩小,台面、剥片面缩短,剥制细石叶的不利条件增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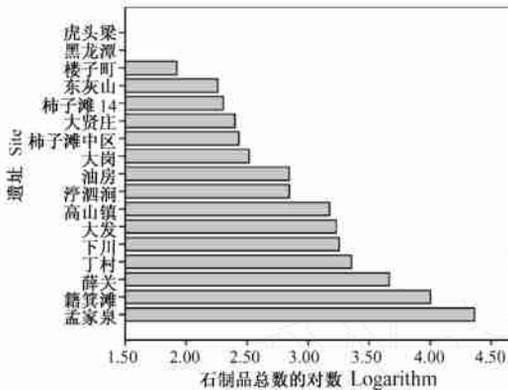
## 5 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含细石叶工艺诸遗址的废弃

籍箕滩遗址作为一个经过比较系统发掘的遗址,材料丰富,报道也相对完整,可以进行一定的废弃文化过程分析,就为进一步分析其他含细石叶工艺产品的遗址提供了一个参考坐标。目前就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含细石叶工艺诸遗址而言,有过系统工作的遗址很少,一部分来自于地表调查,不同地点的材料往往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另一部分来自于发掘,但不同层位、不同地点材料往往也因为特征相似而未加区分;再者,材料的发表不全面,只是选择典型标本报道,遗址组合的全貌不清楚。当然,即使没有考古学家限于当时认识导致的失误,要完整获得遗址的所有材料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会遗弃,更不会所有的东西都会得到埋藏,考古学家也不可能准确地找到所有埋藏在地下的材料。换句话说,考古学家注定要面对具有偏差的材料,通过合适的推理,去寻找有用的信息;同时,通过材料的互相对比,特别是与偏差较小的材料以及确立的研究结果对比,也可以让我们对材料的偏差有更清楚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纠正一些失误。

理论上说,如果是中心营地遗址,因为人们在这里的活动时间比较长、活动内容丰富,所以应该有更多的石制品,石制品中工具比例相对较大、工具种类比较丰富;而于临时营地遗址,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正相反;如果是屠宰地点,会有动物的骨骼作证;还有一些类型的狩猎采集者活动地点,因为活动时间短,保存下来又被发现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这里基本只需要考虑中心营地和临时营地这两种类型的考古遗存。在目前所发表的材料中,因为重视石器工具的研究,往往都能提供工具数量和工具种类这两个变量的情况,因此对废弃文化过程的分析可以从这个角度切入。

从石制品总数上来看(图5),油房<sup>[18]</sup>、大发<sup>[19-20]</sup>、漳泗洞<sup>[21-22]</sup>、高山镇<sup>[23]</sup>、下川<sup>[24]</sup>、丁村<sup>[25]</sup>、薛关<sup>[26]</sup>、籍箕滩、孟家泉<sup>[27]</sup>等遗址数量超过千件,其中孟家泉高达23000余件,细石叶工艺产品只是其石制品组合的一个部分。按原报告的介绍,这个有上、下两个文化层,下文化层遗物比较少,上文化层有晚期遗物混入,“石制品和动物化石丰富,分布不均匀,常富集于泉眼附近,说明文化层形成后被扰动过,扰乱的原因主要是泉水上下翻动和泉眼位置不断变换的结果”<sup>[27]</sup>。遗址发现包括四种食肉目动物在内共计23种哺乳动物化石,也表明人类不是这个遗址的唯一使用者。泉水本身又是特殊有吸引力的资源,它不仅吸引人类而且还会吸引食肉动物;因为食肉目在夜晚都是很活跃的,即使是有较好工具的现代狩猎采集者如卡拉哈里的布须曼人也从不在水源边过夜<sup>[28]</sup>。因此,孟家泉遗址尽管石制品总数很大,但它可能还只是临时营地或屠宰猎物的场所,并非中心营地。

下川遗址选择的是典型标本,石制品的总数肯定要大得多,材料来自于富益河圪梁和水井背两个地方,两者间直线距离近600m。从工具比例上来看(图6),因为下川的样本只是典型标本,所以它的工具比例异乎寻常地高。与此同时,采集的材料如大贤庄<sup>[31]</sup>、楼子町<sup>[32]</sup>同样有比较高的工具比例,这与调查者选择性地采集研究标本有关。大岗作为发掘材料有非常高的工具比例的确非同寻常,但是这里的工具种类非常简单,基本器类只有刮削器和尖状器,算上修背石片和磨刃石片,再细分刮削器,种类才有增加(图7)。大岗的石制品总数比

图 5 含细石叶工艺产品诸遗址石制品总数<sup>1)</sup>

The total stone artifacts from sites  
with microblade produc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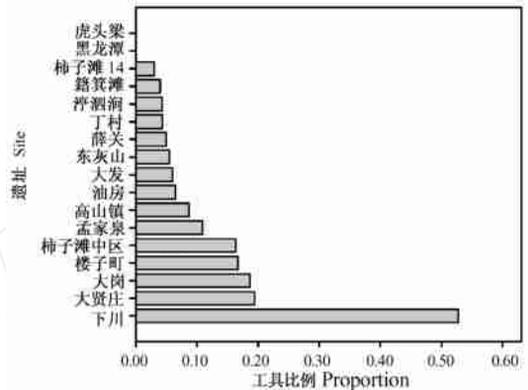


图 6 含细石叶工艺产品诸遗址工具占石制品的比例

The proportion of stone tools from sites  
with microblade products

较小, 遗址中还发现加工石器过程中形成的碎屑, 而不见粗大的石片、石锤、石砧之类的工具, 也没有居住、用火和动物遗存<sup>[33]</sup>, 因此, 这个遗址可能是迅速废弃的临时营地, 当时的人们在这里的活动主要是修理工具, 将它解释成狩猎动物的了望点似乎更加合适。虎头梁遗址 65040 地点也被认为如此<sup>[30]</sup>。在狩猎动物的瞭望点中, 狩猎者不敢燃火, 主要的活动就是修理工具<sup>[28]</sup>。石制品少、缺少用火痕迹的东灰山遗址<sup>[34]</sup>也可能如此。

工具比例高的遗址柿子滩中区<sup>[35]</sup>, 此处遗址石制品的总数很少, 但有用火的痕迹和少量动物骨片, 显示古人在此过夜; 同样柿子滩 14 地点<sup>[36]</sup>, 石制品数量比较少, 也有用火遗迹的, 可能同属于临时营地遗址, 这种遗址中的动物骨骼往往非常细碎, 反映的可能是狩猎者随身携带了肉食, 在这个临时营地中食用。

结合工具种类、数量和石制品的总量来看, 经过发掘的遗址如丁村、下川、薛关、籍箕滩、淳泗涧、大发都可能是中心营地遗址。丁村遗址的工具类型最为丰富, 它有两套工具系统, 一部分是以角页岩、石灰岩等打制的粗大石器, 另一部分是以燧石为主要原料制作的细小石器与细石叶工艺产品。这种状况为丁村所独有。对它的解释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使用细石叶工艺的狩猎采集者同样需要一些粗大的工具完成砍砸一类的活动, 他们在这类工具上的劳动投入往往比较少, 这类工具用完即弃, 属于权宜工具 (expedient tools), 在含有细石叶工艺产品的石器组合中发现粗大的工具并不奇怪; 还有一种可能因为丁村文化层与下覆地层不整合, 粗大的石器可能属于较早的时期, 属于河流侵蚀后的产物。从报告提供的绘图和照片判断, 丁村遗址石器组合中还可以继续使用的工具比例比较高; 和籍箕滩遗址相比, 这里留下来处在细石叶剥制中间阶段的细石核虽然不多, 但比例高 (六件细石核中至少四件处在中间阶段), 而且石叶和细石叶相对数量大, 共计 86 件 (其中属于典型细石叶者 53 件), 这些器物都属于易携带而难加工的器物。因此, 有理由相信这个遗址的废弃速度很快, 很可能和籍箕滩遗址一样, 当时的人们预期还要返回。

油房遗址和籍箕滩遗址一样靠近原料产地, 其石制品的统计没有包括碎块和废片, 共计 2675 件, 远大于石制品的总数, 而且由于侵蚀以及认为人工破坏, 地表还散布大量的石制

1) 黑龙潭<sup>[29]</sup>、虎头梁<sup>[30]</sup>遗址缺石制品总数材料。

品。作为原料产地,古人类会反复光顾,在离开之时也会预期返回。理论上说这种废弃会留下相当多的原料以备将来使用,又由于遗址的反复使用,以及后来人们偶尔也会利用这里的原料,因此考古材料的内容非常复杂,器物与活动区关系不密切,而且油房遗址中还可以使用的器物比较少,也显示其废弃过程比较缓慢,因此很难判断油房遗址是中心营地还是临时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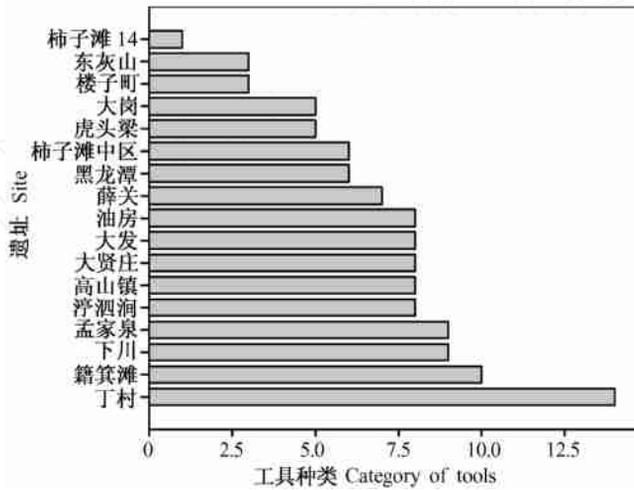


图 7 含细石叶产品诸遗址的工具种类统计<sup>2)</sup>

Tool types from sites with microblade products

和油房遗址相反,淳泗涧遗址远离原料产地,其主要原料燧石据信来自于 15 公里外的武山一带<sup>[21]</sup>。淳泗涧遗址的石制品组合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细小,特别是细石核与细石叶,已经达到了使用的极限。此外,这个组合整体数量不大,但其工具比例低。留下来还可以使用的材料少,尤其是从细石核的意义上来说。这个遗址的废弃显然是有计划的,预期返回的可能性小,所以能带走的器物基本都已带走。

细石核与细石叶无疑是细石叶工艺产品中最重要的产品,对它们的废弃除非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如细石核无法再剥离细石叶、剥离的细石叶不合用等,或是因为废弃太过于匆促。从图 8 中可以看到,细石核废弃量较大的有下川遗址(实际包括两个地点)、虎头梁遗址(包括了九个地点)、籍箕滩遗址(T2 下层细石核废弃量为 62 件),还有薛关遗址。除开虎头梁遗址,下川遗址的两个地点、T2 下层代表的籍箕滩遗址和薛关遗址可能废弃得最为突然,以至于留下这些易携带而难加工的“贵重”器物。

从细石叶和细石核的关系来看,一件细石核可以生产出细石叶的数量,在复制实验中可以超过一百片<sup>[37-38]</sup>,即使古人在每件细石核上只生产出十片细石叶,也就是说遗址中的细石叶的数量至少要是细石核数量的十倍。如在图 8 中,虚线代表的细石核与细石叶的关系才更接近真实,而遗址保存的细石核与细石叶的关系(见实线)相对要平缓得多,也就是说大量的细石叶没有保留在遗址中,它们可能在使用过程中废弃在了野外。

2) 工具分类系统比较多,文中统计刮削器时,将其分为端刮器、凹缺刮器、一般刮削器三种,算三种类型的工具;石叶虽然是工具的一部分,但不单列为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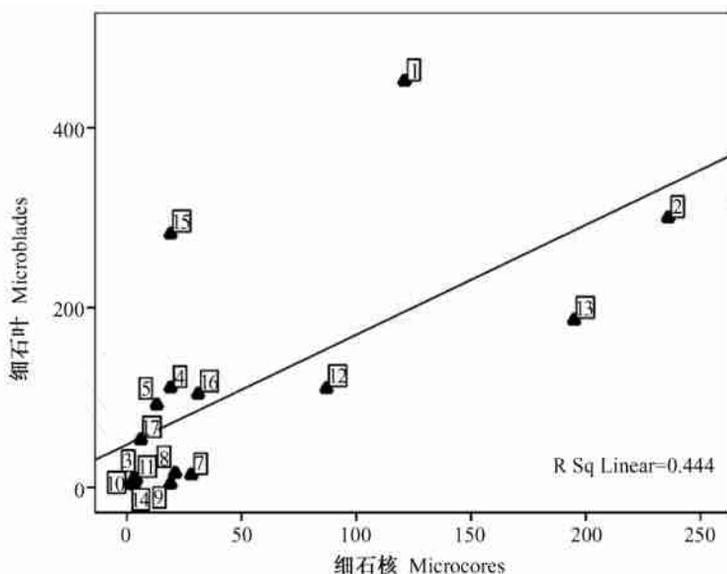


图 8 细石核与细石叶的关系分析<sup>3)</su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corcores and microblades from different sites

1. 籍箕滩 Jijitan, 2. 虎头梁 Hutouliang, 3. 东灰山 Donghuishan, 4. 涪泗涧 Tingsijian, 5. 油房 Youfang, 6. 孟家泉 Mengjiaquan, 7. 大岗 Dagang, 8. 黑龙潭 Heilongtan, 9. 大贤庄 Daxianzhuang, 10. 柿子滩 14 地点 Sizhitan Locality 14, 11. 柿子滩中区 Shizhitan Middle Area, 12. 薛关 Xueguan, 13. 下川 Xiachuan, 14. 楼子町 Louziting, 15. 高山镇 Gao shan zhen, 16. 大发 Dafa, 17. 丁村 Dingcun.

总而言之,在细石叶工艺产品中,最不可能保留在遗址中的就是细石叶,次之就是细石核。制作两面器毛坯产生的大量除皮石片、断块和碎屑最有可能留在离原料产地附近的遗址中。修理两面器毛坯产生的修理石片、修理台面产生的碎屑、削片、第一剥片最有可能留在中心营地中。当一个细石核进入剥片的中间阶段之后,就有可能被携带到临时营地或是其他类型的临时地点中去。如果没有突然的原因,就没有理由废弃大量可以继续剥制细石叶的细石核。

进一步审视华北地区含细石叶工艺的遗址,其废弃过程大致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目前发现的含细石叶工艺产品遗址的废弃是多样的,并不是只有一个模式,其中有如籍箕滩遗址这种迅速但预期返回的废弃方式,也有如涪泗涧遗址这种不考虑返回的有计划废弃方式。中心营地遗址如下川、薛关废弃的速度比较快,而靠近原料产地的油房遗址废弃过程则比较长,同样靠近泉眼的孟家泉遗址也是如此,虽然这里遗物数量巨大,但其特殊的环境决定这里不可能是中心营地,而是人类白天经常光顾的临时地点。此外,临时营地、狩猎动物的涪望点废弃速度也比较快,但由于活动内容不同,所留下遗物特征也不一样,人们在狩猎动物的涪望点中的活动更单纯。

3) 薛关不包括其漏斗形石核,其石片疤不规整;下川的细石叶包括报告所提细小石片和薄长石片;虎头梁细石核计算的是楔形细石核,包括九个地点的材料;丁村指 77:01 地点;柿子滩中区只统计 115cm 以上地层;大发、涪泗涧各包括两次发表的材料。

二是细石叶工艺遗址常以地点群的形式出现,如类似籍箕滩遗存分布范围有 11 平方公里,虎头梁遗址包括至少九个地点,下川遗址包括 16 个地点,柿子滩遗址同样如此,苏北鲁西南马陵山地区的遗址<sup>[39-40]</sup>也是如此,还有陕西大荔沙苑地点群<sup>[41]</sup>等。不同地点之间石制品往往都是难以区分,其中遗物种类丰富,数量众多的地点,如下川遗址、虎头梁遗址的 72117 地点可能是中心营地<sup>[30]</sup>,遗物单纯、数量少的地点则可能是临时营地。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叶工艺遗址这种显著的分布特征不仅表明细石叶工艺是一种代表高度流动性的策略,同时这些地点近距离密集分布也表明人类在有限的范围内活动强度增大。如果考虑到旧石器晚期人口的增加和社会复杂性的发展,人类将不得不强化利用一个有限区域内的资源,地点群就是其表现形式,这种趋势愈晚愈明显。

三是在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最末期(也可以称之新石器时代最早期)含细石叶工艺的遗址中出现一种新趋势,比如在东胡林<sup>[42]</sup>、转年<sup>[43]</sup>、泥河湾盆地的马鞍山<sup>[44]</sup>等遗址,出现陶器、磨制石器、有一定形制的灶、甚至是墓葬等新文化特征,反映此时的狩猎采集者的流动性已大大降低,早期的农业可能已经起源。这些遗址出土物品种类、数量都相当可观,属于非常典型的中心营地。

当然,细石叶工艺产品的废弃过程并不仅仅是由文化过程所决定的,自然营力的作用与改造,比如,流水的搬运、动物的踩踏、冻融的扰动等都会影响废弃物的分布;与此同时,遗址的形成过程非常复杂,在漫长的时间过程中,存在无数的干扰可能。本文侧重的是文化过程的分析,并不意味这些自然过程不重要,希望将来有更多的研究来关注遗址的废弃过程。

## 参考文献:

- [1] 陈胜前. 细石叶工艺起源研究——一个理论与生态的视角. 待刊.
- [2] 陈淳. 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3.
- [3] Kobayoshi T. Microblade industries in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J]. *Arctic Anthropology*, 1970, 7(2): 38-58.
- [4] Whittaker JC. Flintknapping: Making and Understanding Stone Tools[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 [5] Binford LR. Willow smoking and dogs' tails: hunter-gatherer settlement systems and archaeological site formation[J]. *American Antiquity*, 1980, 45: 4-20.
- [6] Binford LR. The Archaeology of place[J].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982, 1: 5-31.
- [7] Schiffer MA. Behavioral Archaeology[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 [8] Stevenson MC.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site abandonment behavior: evidence from historical mining camps in the Southwest Yukon[J].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982, 1: 237-265.
- [9] Binford LR. Constructing Frames of Reference: an Analytical Method for Archaeological Theory Building Using Ethnographic and Environmental Data Set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 [10] 陈胜前. 中国狩猎采集者的模拟研究[J]. *人类学学报*, 2006, 25(1): 42-55.
- [11] 陈胜前. 中国晚更新世—早全新世过渡期狩猎采集者的适应变迁[J]. *人类学学报*, 2006, 25(3): 195-207.
- [12] Schiffer MA.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M].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87.
- [13] Kelly RL. The three sides of a biface[J]. *American Antiquity*, 1988, 53(4): 717-734.
- [14] Odell GH. Investigating correlates of sedentism and domestication in prehistoric North America[J]. *American Antiquity*, 1998, 63: 553-571.
- [15] Keeley LH. Hafting and retooling: effects o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J]. *American Antiquity*, 1982, 47(4): 798-809.
- [16] 河北文物研究所. 籍箕滩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遗址[J]. *文物春秋*, 1993, (2): 1-22, 70.
- [17] 陈胜前. 泥河湾盆地籍箕滩、西水地遗址楔形细石核的研究[D]. 北京大学硕士论文, 1996.
- [18] 谢飞, 成胜泉. 河北阳原油房细石器发掘报告[J]. *人类学学报*, 1989, 8(1): 59-68.

- [19] 高星, 尤玉柱, 陶富海. 山西榆次大发旧石器地点[J]. 人类学学报, 1991, 10(2): 147-154.
- [20] 李壮伟, 王志刚. 山西榆次大发地点的旧石器[J]. 人类学学报, 1992, 11(4): 345-353.
- [21] 河北文物研究所, 秦皇岛市文物管理处, 昌黎县文物保管所. 河北昌黎亭泗涧细石器地点[J]. 文物春秋, 1992, 增刊: 121-127.
- [22] 王恩霖. 河北昌黎亭泗涧细石器遗址的新材料[J]. 人类学学报, 1997, 16: 1-9.
- [23] 陈哲英, 王清诗, 解廷琦. 山西大同高山镇之细石器[J]. 史前研究, 1985, (2): 56-62.
- [24] 王建, 王向前, 陈哲英. 下川文化[J]. 考古学报, 1978 (3): 259-288.
- [25] 王建, 陶富海, 王益人. 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调查发掘报告[J]. 文物季刊, 1994, (3): 1-26.
- [26] 王向前, 丁建平, 陶富海. 山西蒲县薛关细石器[J]. 人类学学报, 1983, 2: 162-171.
- [2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唐山市文物管理所, 玉田县文物保管所. 河北玉田县孟家泉旧石器遗址发掘简报[J]. 文物春秋, 1991, (1): 1-13.
- [28] Binford LR. In Pursuit of the Past[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 [29] 临沂地区文管会, 郯城县图书馆. 山东郯城黑龙潭细石器遗址[J]. 考古, 1986, (8): 673-679.
- [30] 盖培, 卫奇. 虎头梁旧石器晚期遗址的发现[J].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77, 15: 280-300.
- [31] 葛治功, 林一璞. 大贤庄的中石器时代细石器[J]. 东南文化, 1985, (1): 2-17.
- [32] 陈哲英, 吴永春. 山西天镇县楼子町发现细石器[J]. 文物季刊, 1984, (3): 1-4.
- [33] 张居中, 李占扬. 河南舞阳大岗细石器地点发掘报告[J]. 人类学学报, 1996, 15(2): 105-113.
- [34] 河北文物研究所. 燕山南麓发现细石器遗址[J]. 考古, 1989, (11): 967-970, 966.
- [35] 原思训, 赵朝洪, 朱晓东, 等. 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的年代与文化研究[J]. 考古, 1998, (6): 57-62.
- [36] 柿子滩考古队. 山西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 S14 地点[J]. 考古, 2002, (4): 15-28.
- [37] Tabarev AV. Paleolithic wedge-shaped microcores and experiments with pocket devices[J]. Lithic Technology, 1997, 22(2): 139-149.
- [38] Flanniken JJ. The Paleolithic Dyuktai pressure blade technique of Siberia[J]. Arctic Anthropology, 1987, 24(2): 117-132.
- [39] 逢振镐. 山东细石器文化概论[J]. 华夏考古, 2000, (2): 65-73, 102.
-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 山东汶、泗流域发现的一批细石器[J]. 考古, 1993, (8): 673-682, 708.
- [41] 安志敏, 吴汝祚. 陕西朝邑大荔沙苑地区的石器时代遗存[J]. 考古学报, 1957, (1): 1-12.
- [42] 赵朝洪, 郁金城, 王涛. 北京东胡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获重要发现[N]. 中国文物报 2003. 5. 9.
- [43] 郁金城. 北京市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A]. 见: 于炳文主编, 跋涉集, 39-44.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 [44] 严文明. 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 The Abandonment of Lithic Products by the Microblade Technology: A Perspective from Cultural Process

CHEN Sheng-qian

(The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 The microblade technology first emerged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Upper Paleolithic period, and finally disappeared with termination of the Paleolithic epoch. How were the lithic products of this technology, ten types altogether, abandoned in sites or elsewhere? Which factors did influence the process of their abandonment? And how were they expressed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This research starts from the general theory about archaeological abandonment, and then it explores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which include subsistence strategies of prehistoric hunter-gatherers and their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After that, it turns to analyze empirically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from a site (Jijitan Site) to a region (North China).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abandonment process of Jijitan Site represented by the T2 lower layer was very fast, and indicates that people would plan to come back soon. As for North China, the sites with microblade products show diverse abandonment patterns, including the forms of fast abandonment but anticipated to return (e. g., Jijitan Site), and planned abandonment but not anticipated to return (e. g., Tingsijian Site). Moreover, some sites were frequently visited but never used as sleeping places (e. g., Mengjiaquan Site), some sites were rapidly abandoned locations or field camps (e. g., Shizitan Site), and some sites were probably used as hunting stations (Dagang Site). The abandonment of microblade products no doubt relates to the lifeways of its users. Therefore, microblades were the most impossible to be abandoned in sites among all products.

**Key words:** Microblade technology; Abandonment; Cultural process; Subsistence strategy